

劉衍諱著集

【第三卷】

劉衍誦著集



1981年与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中)在岳阳楼



1980年与郑州大学张静教授合影



2003年12月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邓绍基先生在海南太平山庄



1992年与谌东飏教授等在长沙同来访的台湾散文作家兼出版家郭枫先生(中)座谈



1992年与湖南师大吴启主教授(中),日本京都大学高桥弥守彦教授(右)在广州



1995年带研究生访学时与蔡镇楚教授(右)、陈贻焮先生合影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陈宅

2001年8月参加中国  
散文学术会议后摄于  
山东曲阜孔子墓园



1996年9月在首都师  
范大学会见百花文艺  
出版社编审范希文和  
编辑刘淑云

在1997届古代文论硕士生论文  
答辩会上(左为复旦大学蒋凡教  
授,右为导师谌兆麟先生)





1987年在《光明日报》记者谷文雨陪同下参观洛阳龙门白居易陵园

1996年全国高师系主任会议中与高教出版社编审袁晓波在河北避暑山庄



2007年9月在纽约州布法罗市港口参观二战时盟军第六舰队战舰



# 诵读宜博，研究宜专

——谈谈我的散文研究

我的散文研究，其实也是半路出家。不过长期阅读一些优秀作品，长期从事教学和多方向的研究，又为散文研究准备了条件。可以说：“诵读宜博，研究宜专”这一名言，用之于本人，既总结了研究之“所以得”，也点明了研究之“所以失”。

先说之所以失。本人五岁入私塾，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早。但是，兴趣广泛，既爱读散文（即古文一类），也爱学诗词和文法。既爱文学，也爱历史、哲学，甚至医学。读各种各样的书，本不算错，问题在于：不专、不深。因此长时期出不了成果。直到三十多岁，还在写一些应景文字，且多在为单位或政府官员写“遵命”文章。虽然这些文章在上世纪70年代，也公开刊载，但都不具执笔者姓名，往往是一些“经验”、“报告”之类的速朽之作。我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从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开始，研究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写些论文，其成果主要有后来出版的《教学语法答疑》（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和一些论文。接下来，研究唐宋文学。虽然研究方向比较地“专”些了，但我意识到还应更专门一些，最后定格于研究中唐，研究李贺。从1979年至1989年，我先后撰著出版了《李贺诗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贺诗校笺证异》（湖南出版社，1990年）。这两部著作也先后都得到国家级报纸、刊物的好评。如1985年5月2日，《人民日报》评介《李贺诗传》“是一本较有创见的专著”；1992年第3期的《文

学遗产》以五千多字的长篇书评为《李贺诗校笺证异》作了定评。李贺研究的成果，是“研究宜专”所得，而且还启示我，在散文研究领域，也不能漫无边际，四面出击，而应该相对集中。因此，我就把范围缩小到只研究古代的散文，且从“史”的角度切入。这也就是我的散文研究之所以得了。

说到古代散文研究，我其实早就有兴趣，也准备了一定条件。如：一是多读作品。古代散文，作品多如牛毛。我曾说：“读五十年书方可研治散文史。”这不是说我读的书如何多，只是说，我已意识到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正确，自己也还算是注重读书的人罢了。二是收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资料，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我曾对我的研究生说过：“做人，要本分；做学问则要踩着前人的肩膀上。”踩着前人的肩膀上，当然不是不尊重前人，而是要博采众长，但又要超越前人，或有所前进。三是必要的学术积累。读书，收集资料，即是某种意义上的研究前的积累，但还有必不可少的环节：阶段性和个别性问题的超前研究。我在上世纪中期学着写过散文，发表过有关问题的议论或文章。80年代则着重研究古代散文的文体特点，古代散文的概念范围等。还在本科生班开设过“散文研究”选修课。这些前期工作无疑为我的古代散文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但主要成果却是九十年代取得的。

1993年我在《中国散文史纲》的《后记》中写道：“五年前，我就在琢磨着写一部散文史，并得到一些朋友的怂恿，但迟迟不敢动手。因为势单力薄，又无出版把握。真正动起来，还是1991年初。”从1991年开始的十年，是我专心于散文研究的十年。也与李贺研究的十年相似，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其中，我主编并撰写了古代卷的《中国散文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被学术界誉为“第一部贯通古今的散文通史”（1996年中国古代散文学会成立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



谭家健先生发言稿持此评)。在此基础上,我继续研究,重点拓展唐宋散文史的领域,出版了《中国古代散文史论稿》(南方出版社,2000年)。此后,我的《中国古代散文史》(高教出版社,2004年)也可以说是十年研究的结晶。至于其间发表的论文,主编的《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导读》(南方出版社,1997年)、《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古代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则是十年研究的附产品。

主编者要求谈谈我的散文研究的主要成就,我想不妨先引证一些书评。《中国散文史纲》于1994年6月出版后,全国和地方一些报刊发表过较多的书评。《湖南教育报》于1995年1月14日刊发了《一项很有意义的系统工程——读刘衍教授主编的〈中国散文史纲〉》书评;1995年2月13日《长沙晚报》刊发了《万家翰墨搜罗尽,铸成〈史纲〉几千秋》书评。接着,《湖南日报》于1995年5月4日刊登署名文章《散文研究园地的一朵奇葩》,认为《中国散文史纲》“填补了我国散文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体系完备,分量颇重”。该文还认为,《史纲》作者“表现出了可贵的学术勇气和胆识”,“全书文字洗练流畅,使本来枯燥的学术著作具备了较强的可读性”。《文艺报》于1995年3月25日还转载了评论家龙长吟的书评。认为“无论是从论述的深度或包罗的内容或历史的覆盖面,《史纲》都是一部合格的中国散文通史的专著”。

《中国散文史纲》,确是一部拓荒性质的著作。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过方孝岳、陈柱的专著,但前者仅三万余字,后者十万余字,均用文言写作,且观点已相对陈旧,论述也比较浅。80年代,出版过北京师范学院编写的《中国古代散文九讲》;郭预衡先生的《中国散文史》上册也已经问世。但是,作为通史性的专著,当时尚未出现;尤其是将古代、近代、现当代融贯一气的著述,更无从闻见。毫无疑问,对于上述已有

的著述，还有当时一些断代的，或者散文理论的专著，我们都作过审读、研究和借鉴，但作为系统性的工程，要描述和论证我国散文文体全部演变和发展的历程，清理出轨迹，揭示出规律，的确是“前无古人的”（林非）拓荒性工程。《史纲》的出版，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心和支持。北京大学陈贻焮先生，为该书题写书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专家林非先生在序中还赞许《史纲》：“像这样系统地分析和论列从甲骨文开始，而以当今散文创作和理论研究作为收尾的全部散文现象，确乎是从未有哪一位文学史家这样去认真地做过的”、“这既是个英勇的壮举，又是个出色的创举。”

继《中国散文史纲》之后，1997年我又主编和出版了《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导读》；2000年出版了个人专著《中国古代散文史论稿》。前者是为大学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选修课作教材而编；后者是本人在《中国散文史纲》基础上，对古代散文所作的进一步研究。其中，特别对唐宋散文作了深入开掘，在作家、作品的评论和散文理论的研究上，又有较多的创获。例如，对“燕许大手笔”的盛世之文和中唐前期陆贽的新体骈文的肯定，破除了散文研究的禁区；对韩愈、柳宗元的散文理论和欧阳修、苏轼的散文理论进行重点分析、比较，既探讨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的联系和同异，又为古代散文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依据。特别是对苏轼的理论做了较深刻的剖析。又如，对与宋并立的辽金政权下的散文及其发展状况，也作了较全面的论析，并把它纳入宋文，作为宋文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再如，对南宋朱熹之文持肯定结论，而对贞德秀、魏了翁等道学家之文进行批判，如此等等，都是站在当代散文理论的高度，对其进行审视，既有现实性、科学性，又不以今律古，不搞虚无主义，因而具有较独特的个性，较新的学术见解。

作为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古代散文史》的编著，是本人在散文史研究领域的总结性成就。它既汲取了第一个阶段在《史纲》中的原创性成果，也有选择地采纳了《论稿》这个分阶段的研究创获。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体例比较科学。该书突破传统的按朝代更替分期，按社会性质立题等框架，而以散文本体的萌芽、成型、发展、演变以及理论建构为经线，既对纵向历时性的文体发展规律进行概括，又对横向共时性的散文现象、作家作品进行定位和排序。这对当前流行的文学史体系是一个突破，在学术上也具有创新性。如用“本体论”、“系统论”、“阶段论”论文论史。用这些理论给文体发展分阶段，给文本作阐述，为作家定地位；全书共分八篇二十章，“篇”用以分阶段，“章”主要作横向探讨，但也兼及时代和发展阶段，而在每章中立节，则是作品、作家和文体系统中的子系统。这都是本书的特色。

第二，观点、内容有创获。作为普通高校教材，当然与个人学术专著不一样，其中必须兼顾学术界认同的一些观点和内容。例如对骈文，对赋这样一些体制，就不能自行其是，随意排拼。但是，在本教材中，仍然融入了自己多年探索的成果。例如，上探散文源头就依据考古新发现，加入了“龙山陶文”和尧舜古城遗址等材料，从而将上古散文之源，向前推了八个世纪。下论古代散文的终结，就由“超越桐城派樊篱”和“龚自珍的觉醒”等散文家为例，得出结论，避开了“桐城中兴”和近、现代混杂的情形，既能节省篇幅，又更符合文体演变史实，也更科学，更合理。此外，本书在各章节中，在有关散文流派，有关作品、作家的评价和论断上也时有新见，此不赘述。

第三，既注重实用，也注重文学审美，论述讲究信、达、

雅。这一点是本书十分强调的。因为，散文，现代又称美文。尽管古代散文重在“信”与“达”，但古代作家在宣泄情感、释放灵魂时，在思索人生、感悟人生和反思历史时，也往往达于至善至美，文笔很“雅”。我们写史，理当讲究精当，追求文学审美价值。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本人所有著述都注重的，故往往得到读者的好评，得到学生的喜爱。

综上所述，本人的学术研究大体上可分三个阶段，三个十年。头十年，研究语言、文字为主；第二个十年，研究诗词，尤以研究李贺为主；第三个十年，主要研究散文，尤以治史为主。总结这几十年的历程，我认为，“诵读宜博，研究宜专”是至理名言。就我本人而言则是：有所失在此，有所得亦在此。假设我这三十年能更专一些，我想取得的成就可能会大得多。但是，时不再来，岁月不我待。写此留与后学，也许不无裨益吧！

2004年10月5日写于岳麓山之至善斋

# 目 录

诵读宜博，研究宜专	
——谈谈我的散文研究 .....	1
引论 .....	1
第一章 隋及唐初的散文 .....	19
第一节 隋代散文与文风之变 .....	21
第二节 魏征、王绩与唐初文风革新 .....	30
第三节 初唐四杰的骈文与散文 .....	35
第四节 陈子昂的复古与反骈 .....	43
第二章 盛唐的骈文和散文 .....	50
第一节 骈文的兴盛与渐变 .....	51
第二节 张说、苏颋的“大手笔” .....	59
第三节 散文的发展与复兴 .....	67
第三章 中唐前期散文的复古与骈文的自赎 .....	75
第一节 萧颖士、李华等人的复古 .....	76
第二节 元结等人的散文 .....	84
第三节 陆贽和骈文的自赎 .....	94
第四章 韩愈、柳宗元和古文运动 .....	100
第一节 韩愈和他的古文理论 .....	102
第二节 韩愈的散文成就 .....	112
第三节 柳宗元的思想与古文理论 .....	134
第四节 柳宗元的散文成就 .....	144

第五章	中唐其他作家的散文	163
第一节	李观、欧阳詹等穷愁儒士的散文	164
第二节	刘禹锡等迁谪文人的散文	172
第三节	白居易等诗人、政治家的散文	183
第四节	李翱、皇甫湜等韩门弟子的散文	193
第六章	晚唐五代的散文	205
第一节	杜牧、孙樵及古文运动的衰落	207
第二节	李商隐与骈文的回潮	217
第三节	罗隐、皮日休等与小品文的复兴	227
第四节	五代十国骈文复炽与散文作家	238
第七章	北宋前期的散文	245
第一节	柳开、王禹偁的革弊复古	246
第二节	穆修与骈体“时文”的对峙	253
第三节	范仲淹与古文革新高潮的孕育	259
第四节	尹洙、石介、苏舜钦的散文	264
第八章	欧阳修和北宋新古文运动	276
第一节	欧阳修的生平和新古文理论	277
第二节	欧阳修的散文创作成就	288
第三节	曾巩、王安石的散文	304
第四节	苏洵、司马光等人的散文	318
第九章	苏轼及北宋后期散文	330
第一节	苏轼的生平、思想与散文理论	330
第二节	苏轼散文的杰出成就	337
第三节	苏辙的散文	352
第四节	苏门后学的散文	360
第十章	南宋前期的散文	373
第一节	宗泽、胡铨等政治家的散文	374
第二节	陆游、辛弃疾等诗词大家的散文	384

第三节	朱熹、叶适等学者的散文 .....	401
第四节	笔记散文的兴盛 .....	408
第十一章	南宋后期的散文 .....	414
第一节	伊洛之学与散文的衰变 .....	414
第二节	周密等人的笔记散文 .....	420
第三节	文天祥等殉国志士的散文 .....	426
第四节	谢翱等易代遗民的散文 .....	434

## 引 论

唐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传统散文发展和繁荣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的散文，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长期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真正从经史、哲学、律令和应用文中独立出来，发展了创作技巧，提高了审美价值，成了文学领域的重镇。虽然隋唐、两宋也有过短暂的动乱，但这一时期的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空前发达，思想相对自由，文化环境相对宽松和充满生机。散文作家不仅和诗人、词人一样充满信心 and 豪气，而且征文射策、殚精竭虑以诗文跻身仕途、借此实现自己的修齐治平的理想，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散文领域，名家、大家蔚起，作者之众、作品之多前无可匹。清代董诰等人编写的《全唐文》和陆心源的《唐文拾遗》、《唐文续拾》，计有 1088 卷，作品达 2 万余篇，作家 3300 多人。宋代散文，南宋吕祖谦编有《宋文鉴》，清人庄仲方辑有《南宋文范》，但都不全，据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辑的《全宋文》计，作品已达 10 万余篇，作家亦有 5000 余人。唐宋散文，不仅作品作家的数量空前，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创作质量之高，题材、体裁、风格、流派的多样化以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等方面。“唐宋八大家”更是后人模仿的榜样，代表着中国传统散文的最高成就。

以唐代而言，散文的根本变化是在中唐，但其发展历程则可以追溯到隋和唐初。早在隋代开国之初，李谔及隋文帝就不



满于六朝浮华文风，并采取了一些兴革文风的举措，只是时间甚短，积习难改，时俗之文，却变化不大。唐承隋制，开科取士，不仅总结了隋亡以前的历史经验，广开才路和实行开明政治，而且励精图治，很快出现了“贞观之治”。政治上、思想上的相对开明，解除了文人的顾虑；国力的强盛又振奋了文人的信心。因此，初唐之文，思想、情感有了根本性变化。不仅魏征等重臣敢于以文章直言极谏，而且不肯与治世俯仰的王绩也敢于发发牢骚，四杰和陈子昂等才高位卑的文士，更是长风一振，以风雅革浮侈，倡复古风。他们的文章，使积年绮碎，一朝清廓，文风大变。虽然武周时期从统治思想到政权机构都有很大变化，还出现过李峤、苏味道、崔融等御用文人，但复古反骈的呼声仍然甚高。

盛唐之文，骈体兴盛，表面看，似乎有所倒退，但实质上，也在发展。一方面骈文自身疆域开放，大手笔张说、苏颋为文，引散入骈，丕变习俗；王维、李白、任华等骈散兼擅，一扫空疏文风，有盛唐气象。另一方面盛唐散体之作相对于唐初也有较大发展，尤其是天宝时期散文更有成就，盛世危机和忧患之感也相当突出。安史之乱前后，更有萧颖士、李华等崭露头角，提出了效法三代古文的复古口号。其后，又有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愤世嫉邪，为文复古。而身居宰辅的骈文家陆贽写的辅世救失之文，笔酣辞畅，不用事用典，也是开国以来不曾有过的骈体文的自赎。

中唐之文，既是对前朝古文先驱者的继承和发展。又是配合朝政改革，从文风到文体的一次彻底革命。面对安史乱后朝政日非，割据势力的猖獗、佛老思想的盛行，许多文人以天下为己任，或干谒求进，或作官行道，兴利除弊之文日趋增多，志道明道之心日见急切。韩愈、柳宗元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崛起于贞元、元和之间，并成了古文运动的领袖和旗手。他们用